

Ⅱ. 专 文

1985 年中国经济发展综述

马 洪

1985年,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指导下,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全年社会总产值16,242亿元,比上年增长16.2%。其中工农业总产值13,269亿元,比上年增长16.4%。国民收入6,765亿元,比上年增长12.3%。在生产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市场繁荣活跃,财政状况好转,城乡居民收入增加。1985年经济形势总的特点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和初战告捷,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而经济的持续增长,又为改革提供了条件并提出了新的改革要求。具体说来,有以下特点:(1)农业在生产结构调整中全面发展;(2)需求过度膨胀、经济“过热”的情况得到缓解;(3)财政状况在连续几年赤字的情况下首次出现盈余;(4)经济体制改革在稳定、消化、巩固中前进。

一、农业在生产结构调整中全面发展

1985年,各地农村认真贯彻中央一号文件,在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方面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农村经济呈现出全面发展的好形势。主要表现在:(一)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越来越多的农民逐步转向非农产业,包括各类个人和集体开办的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服务业等经营活动。与上年相比,1985年农村社会总产值增长15.6%。其中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总产值增长37.4%,所占比重由上年的36.5%上升到42.3%。同时农村经济商品化的进步也很明显。全年农村工农业产品商品率由上年的61%上升到63.9%。其中农副产品商品率由上年的52.7%上升到53.9%;农村工业产品商品率由上年的83.7%上升到84.6%。(二)1985年农业总产值(包括村办工业)4,510亿元,比上年增长13%。其中林牧副渔业的比重由上年的42.1%上升到49.9%。肉奶蛋等畜禽产品增长幅度较大,猪、牛、羊肉年产量1,755万吨,比上年增长13.9%;牛奶产量250万吨,比上年增长14.2%。(三)农作物种植面积有较大调整。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440多万公顷,是近几年来调减幅度最大的一年;经济作物面积增加353万多公顷,是近年来扩大最多的一年。同时,除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使粮食产量减少,以及由于计划压缩棉花种植面积使棉花产量减少外,油料增长32.5%,甘蔗增长30.2%,黄红麻增长128.1%,烤烟增长34.5%,蚕茧、茶叶也都增产。总

之, 尽管1985年粮棉减产, 但由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广泛开展多种经营, 以及农村改革的继续深入, 使整个农业出现了五业兴旺的景象。

二、工业生产持续协调发展, 增长速度由“超高速”逐步趋于正常

1985年工业总产值(不含村办工业)达到8,759亿元, 比上年增长18%。其中轻工业总产值4,089亿元, 比上年增长18.1%, 重工业总产值4,670亿元, 比上年增长17.9%。轻工业增长超过重工业, 轻重工业发展比较协调。一次能源产量(折标准煤)8.39亿吨, 比上年增长7.8%。其中原煤8.5亿吨, 增长7.7%, 原油1.25亿吨, 增长9%。煤炭工业贯彻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 产量稳步上升, 煤炭供应的紧张情况有所缓和, 钢厂、电厂存煤普遍增加, 出现了多年未有的好形势。电力建设进展较快, 全年新增发电装机540万千瓦。特别是小水电发展很快, 发电量相当于全国农业用电的三分之一。但是, 电力供应仍然紧张。原材料工业和建材工业也有较大增长。1985年钢增长7.3%, 钢材增长9.1%, 10种有色金属增长7.2%, 主要化工原料多数也有增长。但与整个工业的发展相比, 原材料工业仍然比较落后。

1985年工业生产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生产适应市场需要和价格调节作用日益明显。在控制增长速度中, 滞销积压的产品增长速度减慢; 畅销的产品持续增长。如轻工业中电视机、录音机、家用洗衣机、家用电冰箱等, 比上年分别增长52.7%到1.6倍。其中受群众欢迎的彩色电视机、双缸洗衣机、双开门电冰箱增长更快, 占同类产品的比重, 由上年的13%、20%、27%分别上升为25.3%、34%、34%。穿的产品中, 高档的丝织品、呢绒、皮鞋分别增长20.7%、20.3%和12.2%。吃的产品, 糖、罐头、乳制品、啤酒、味精分别增长19%到40%。而一些老产品, 如黑白电视机、缝纫机、塑料制品、灯泡、合成脂肪酸等则由于社会需求的限制而增长缓慢, 甚至出现负增长。重工业中, 市场短缺的线材、薄钢板、硅钢片、无缝钢管、10种有色金属、人造板、水泥、平板玻璃等产品的生产持续高速增长, 而滞销的化肥、农药、合成氨减产较多。汽车、拖拉机等机械产品则因为销路问题由畅销转为滞销, 从10月份开始减产。

1985年, 特别是上半年, 工业生产出现了“超高速”增长的情况(一季度增长22.6%, 二季度增长23.3%)。这是1984年第四季度以来信贷失控,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造成的。而从根本上说,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对经济改革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微观放活和宏观控制的关系还缺乏经验, 对体制模式转轨过程中的宏观控制抓得不够紧, 以及旧体制固有的扩张特性还未得到消除。由总需求膨胀所刺激起来的“超高速”增长, 在旧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价格体系还没有理顺的情况下, 使经济结构的不合理状况更为严重。资源短线绷紧, 外汇储备下降, 等等, 不仅使“超高速”难以为继, 也使经济改革的良好环境受到影响。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发现了这种不正常状况, 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抽紧银根, 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 等等, 使膨胀的需求逐步得到抑制, 增长速度从下半年开始缓缓下降, 趋于正常。与上年同期相比, 7月份增长20.4%, 8月份增长17.5%, 9月份增长14.5%, 10月份增长11.7%, 11月份增长8.8%, 12月份增长10.2%。

三、重点建设和企业更新改造进一步加强,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过猛的势头得到初步控制

1985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061.4亿元, 比上年增长42.8%。其中能源工业投资201亿元, 比上年增长20.6%; 交通邮电投资176亿元, 增长51.5%。国家按合理

工期组织建设的169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27亿元,为计划的1.01%。现有企业更新改造进展较快,1985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完成更新改造431亿元,为计划的119.7%,比上年增长39.5%。其中机械、电力和轻纺工业更新改造投资已经超过当年基本建设投资。

1985年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加318亿元,超过前3年增加额的总和;比上年增长42.8%,是1971年以来增长速度最高的一年,大大超过了按现价计算的国民收入和重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针对这一情况,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控制措施。从三季度以后,投资增长速度逐月减慢,7月份略减为50.2%,8月份降到28.6%,9月份进一步降到23.7%,10月、11月略有回升。应当看到,尽管经过努力,投资膨胀的势头得到了初步控制,但由于诱致投资膨胀的因素(特别是旧体制固有的“投资饥饿症”)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消除,投资增长速度的暂时放慢,只不过是通过对行政性强制手段,把漂在水面上的葫芦按下了水,压制力稍一放松,它就会重新浮上来。因此,控制投资规模将是今后较长时期的任务。

四、市场繁荣,物价由涨转稳,人民生活得到进一步改善

1985年随着城乡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工业高速增长,市场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主要特点是:(一)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持续高速增长。1985年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305亿元,比上年增长27.5%,其中城市为29.8%,乡村为25.9%;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17.2%,是近几年增长最快的一年。(二)吃、穿、用商品零售额全面上升,家用电器尤为迅猛。统计局公布的零售额数字表明,1985年粮食增长5.1%,食用植物油增长13.9%,猪肉增长7.6%,鲜蛋增长20%;纯棉布增长11.8%,化纤布增长5.3%,针织内衣裤增长9%,毛线增长26%;手表增长28.8%,自行车增长8.1%;电风扇增长一倍,电视机增长59.9%,洗衣机增长69.9%,电冰箱增长1.5倍。(三)在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消费品零售额增长30.7%,大大超过了农用生产资料零售额7.9%的增长幅度。这反映了农民投资积极性不高的不良倾向。(四)个体经济零售额急剧上升,比上年增长1.1倍。个体经济在零售商品中所占的比重,也在近几年连续上升的基础上,由1984年的9.6%,上升为15.7%。此外,随着物资流通体制改革的逐步开展,市场调节范围扩大,生产资料贸易中心由上年的96个,增加到644个,全年经营额达105亿元。物资部门定额流动资金周转天数为64天,比上年缩短了4天。

1985年我国物价水平上升幅度较大。据统计,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比上年平均上升8.6%;零售物价总指数比上年平均上升8.8%,其中城镇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了12.2%,农村上升了7%。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的水平都达到15%以上。从商品的情况看,鲜菜价格上升34.5%,肉禽蛋上升22%,水产品上升34.3%,鲜果上升35.9%,粮食上升10.9%,书报杂志类上升32.5%,燃料上升4%。造成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主要原因,一是价格的结构调整,这是为了理顺经济关系;二是社会总需求过剩,商品供不应求;三是农副产品价格大部分放开,计划外工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带动了部分消费品价格上涨;四是工作安排上的缺陷,如有些城市蔬菜价格放开的准备工作不够充分;五是一些企业和商贩,违反国家物价政策,变相涨价或乱涨价;等等。全年市场零售价格上涨从第二季度开始,第三季度特别是9、10月间达到高峰(1~3季度价格指数分别上升了5.6%、8.8%、10.1%),在国家采取宏观紧缩和平抑物价的措施后,物价急剧上升的势头从年底开始放缓,没有出现新的波动。

虽然1985年物价水平上升幅度较大,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大发展,各种经济责任制的落实,以及工资改革的出台,城乡人民的收入进一步增长,人民生活也有了新的改善。据统计局的抽样调查,1985年农民每人平均纯收入为397元,比上年增加42元,增长11.8%,扣

除物价上升因素,实际收入增长8.4%;城镇居民每人平均收入752元,比上年增长23.8%,扣除职工生活费用价格上涨因素,实际收入增长10.6%。城乡人民储蓄随着收入的增加也大幅度增长。1985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1,623亿元,比上年末增长了33.6%。此外,1985年全国还新安置待业人员360万人;新建住宅城镇约为1.3亿平方米,农村约7亿平方米。

五、对外经济关系进一步发展,财政收支实现当年平衡

1985年,在党的对外开放方针的正确引导下,我国进出口贸易继续增长,利用外资规模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了新发展。据海关统计,全年进出口总额达696.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0%。其中,出口总额273.6亿美元,增长4.7%;进口总额422.6亿美元,增长54.2%。大量重要物资和商品的进口有力地支持了国内的生产和建设,对稳定市场物价和改善人民生活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出口增长较少,进出口逆差过大,从长远看对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此外,1985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4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9.3%;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794项,合同金额11.9亿美元;接待了来自164个国家和地区的旅游人员1,783万人次,比上年增长38.8%,全年旅游外汇收入为12.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0.5%。所有这些,都标志着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新进展。

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并做到当年收支平衡,是1985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多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始终徘徊在一千亿元左右,一般每年只能增收五、六十亿元。虽然从1983年以来财政收入开始稳定增长(1983年、1984年分别比上年增长收入127亿元和255亿元),但财政赤字一直保持在30~50亿元左右。1985年财政收入一举增加362亿元,使全国财政总收入达1,854亿元(其中国内财政收入1,829亿元),并在支出有较大增加的情况下,做到了当年收支平衡,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但是也必须看到,在增加的收入中,有一些特殊因素,如上半年工业生产超高速增长,部分商品价格上涨,以及进口大量增加,使关税猛增等等。扣除这些因素,1985年的财政收入仍比上年增长16%左右,也是较高的。

六、农村改革深入发展,城市改革初战告捷

1985年,农村改革在继续巩固前几年的改革成果,进一步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发展多种经济联合的基础上,又将延续了几十年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改为合同订购制,同时调整了粮棉的购价和粮食销价。这一改革,有利于推动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又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在城市,价格和工资改革也迈出了不小的两大步:继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放开后,农副产品包括猪肉、鲜蛋和蔬菜的价格也相继放开,铁路短途运价进行了调整,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进行了工资改革,实行了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初步使国家机关的工资制度纳入了新的轨道。这些改革措施对搞活经济,增强企业活力,减少财政补贴,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使我们在运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从总体上看,1985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是好的,成果是显著的。但是,还应当看到,在好的形势下也存在着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其中,既有长期以来一直存在,虽然在改革中有所克服,但在改革目前所处的阶段尚难根本解决的问题,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过猛,特别是预算外投资的增长失去控制,消费基金在前几年有较大增长的基础上,仍然潜伏着巨大的膨胀压力等等;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结构问题。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的矛盾,投资结构与需求结构的矛盾,都随着经济发展开始由“温饱型”经济转向“小康型”经济而急剧突出和尖锐化,其症结的主要方面在于生产要素缺乏合理的流动性;在分配方面,由于价格和工资改革以及其它措施缺乏很好的配套,使得收入分配中苦乐不均和平均

主义大锅饭同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此外，在宏观控制方面，由于双重体制并存和行政性分权倾向强化了地方利益，使得资源合理利用和配置的效益下降，且难以调整；物价总水平上涨过快，特别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副食品价格偏高；以及紧缩银根中“一刀切”的缺点，也都是需要我们引以为戒的。为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大好形势，取得更大的成就，1986年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要通过对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进行巩固、消化、补充、改善和进一步的改革逐步予以解决。

加强宏观调节和控制，保证 经济协调稳定发展

姜 巍 张建军

1985年，是经济发展和改革经济体制很重要的一年。搞好这一年的工作，对促进“七五”计划期间经济发展，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都有重要作用。实践证明，这一年在继续搞活微观的同时，加强了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是有成效的。正如赵紫阳总理在六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讲到：“经过去年一年的工作，有的问题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总的来看，经济环境正在从紧张向宽松转化。”

1985年加强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是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的。从1984年第四季度以后，在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主要是在经济形势好转的情况下，一度出现追求超高速的现象，工业生产发展速度过快，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货币投放过多，国家结存外汇下降。问题的核心是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上述问题如不及时加以解决，将不利于国民经济稳定发展。

加强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也是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提出来的。从近几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来看，微观放开搞活和加强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都是改革的重要内容，缺一不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的活力，进一步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使其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具有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并通过横向经济联系，逐步形成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在进一步搞活微观和加强横向经济联系的情况下，必须加强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使微观搞活和宏观调节相结合，逐步做到活而不乱，控而不死。经济越是搞活，宏观的调节和控制越要加强。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过程看，改革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旧体制的消亡和新体制的形成，只能是逐步进行的。由于旧体制在许多方面失去作用，必须尽快地建立新的宏观经济调节体制，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经济的稳定发展，从而避免或减少经济的动荡和混乱。

对于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一些不稳定因素，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法律、行政手段和措施，逐步加以解决。为此，从1985年2～10月，国务院先后召开了四次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同志会议，并两次派出工作组，贯彻落实省长会议精神，开展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

消费基金增长过快,是1984年第四季度和1985年初首先反映出来的问题。主要是有些地区、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乱发奖金、实物,擅自搞工资浮动甚至升级;有的使用行政经费购买高级消费品,请客送礼;个别单位为了扩大工资基数,甚至修改统计数字。据统计,1984年全国工资性支出比上年增长22.3%,大大超过了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行政经费比上年增长28%。这种情况不仅造成宏观经济不平衡,而且影响工资改革和物价改革的顺利进行。为了控制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的势头,刹住不正之风,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1.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限期内报告1984年奖金发放情况,严格按照规定征收缴纳奖金税,凡为逃避奖金税而滥发的实物或补贴,要折价退款、照章缴税。

2. 先后下达了1985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工资总额计划和行政事业单位调资控制指标,从总量上控制工资总额的增长。同时,鉴于一季度工资总额增长仍然过快的情况,要求银行以3月份为基数对工资性支出进行控制,并设立消费基金专项帐户,进行管理。

3. 调整国营企业奖金税的征收标准,征收起点由两个半月改为四个月;实行工资与上缴利税挂钩的国营企业开征工资调节税;对事业单位等也开征奖金税。

4. 要求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单位削减行政经费,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特别是属于国家专项控制的商品,除新建单位和某些特殊需要经批准外,不得擅自购买;严格控制行政编制,尽量不增加或少增加行政人员。

5. 制止滥发各种彩票、奖券,不许以有奖销售方式推销残次积压商品,停止免费供应午餐。

由于1984年信贷收支差额较大、货币发行偏多,1985年又要进行工资、物价改革,为此,国家采取了紧缩银根的方针。主要措施是:

1. 实行“统一计划、划分奖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专业银行要按规定如数按期交存应上缴人民银行的资金,不得截留占用;资金周转发生困难时,可向人民银行申请临时贷款,各专业银行之间可以相互融通。

2. 先后两次提高城乡居民定期存款利率,相应提高了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贷款利率。

3. 人民银行总行对所属分行和各专业银行总行的信贷计划、信贷差额、现金投放和回笼计划;按季进行控制和一定范围的检查。

4. 乡镇企业 and 专业户向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借款一般要有50%的自有资金,有困难的要有30%。对不符合贷款政策的,不予贷款。

5. 加强对低息优惠贷款利率的管理。对贷款项目进行清理,因情况变化已不符合优惠条件的,停止优惠。逐步实行“先收后退”的办法,即贷款时先按原利率档次照收利息,项目完成并达到预定经济效益的,再行退息。

投资规模膨胀,战线拉长,明显超出了我国国力的可能,使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绷得很紧,而且还有继续膨胀之势。为了有效地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采取了以下措施:

1. 重申严格按计划办事,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要求各部门、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必须按计划执行,不得自行扩大。并明确指出1985年不再追加各地区、各部门的计划指标。对经济效益确实好的项目,各地可以继续安排建设,但必须在投资总规模之内进行调整。

2. 各级银行不准发放计划外固定资产贷款,各地区、各部门不准用银行贷款以自筹资金名义擅自扩大建设规模。除建设银行外,其它银行不得办理自筹基建存款和贷款。自筹基建资金,凡当年6月30日以后存入建设银行的存款,当年不得动用。上半年存款额低于自筹基建投资指标的,要核减自筹指标;存款额高于指标的,按指标进行控制。

3. 对“五不纳入”^①基建项目进行清理,按规定的资金渠道和用途进行建设。除中小学外,对其它“四不纳入”要进行控制,下达建议数,纳入投资总规模。

4. 利用外资安排的基建和技改项目,必须按规定的审批权限和程序,经过批准才能对外谈判。

近几年来,我国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对加快经济发展、繁荣市场和促进改革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从1984年第四季度以后,进口用汇剧增,外汇收支逆差不断扩大,结存不断下降,管理上也出现了某些混乱现象。如有些地方未经国家批准,大量进口市场紧俏商品,牟取高利;有些地方出现炒买炒卖外汇、套汇、逃汇等投机活动。这对我国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十分不利,也影响国家外汇平衡。为此,国家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1. 加强外汇管理。全面清理、检查外汇的安排使用情况和外汇管理条例的执行情况,扭转外汇管理上的某些混乱现象;坚持实行额度管理,严禁非法倒卖外汇,加强贸易外汇的管理。

2. 实行计划控制。对地方、部门使用自有外汇进口,实行严格的计划控制,由国家下达进口计划用汇指标,各地区、各部门不得突破。未经批准超出计划控制指标的,外汇管理分局可以拒绝拨汇,中国银行分行可以拒开信用证。

3. 修订外汇分成办法。对出口商品收汇,实行金额比例留成。即除了出口的增产原油、增产成品油等项外,对一般出口商品收汇留成,按25%留给地方、部门、企业。对超计划出口的部分,由地方承担盈亏,外汇实行中央和地方倒“三七”分成。对当年超计划出口商品留成外汇,地方可在当年下达的进口用汇计划之外,按照有关规定,进口一部分生产和市场需要的物资。

4. 利用税收调节外汇收支。对进出口产品征、退产品税或增值税。对若干进口商品开征进口调节税。

5. 为严格控制重复引进、盲目引进和多头对外,对进出口商品实行许可证制度。任何部门和地区未取得进口许可证,一律不准自行进口。

为了稳定物价,控制价格上涨,采取以下一些措施:

1. 重大的价格改革措施和重要商品调价,必须按国务院的统一布署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和工商企业都不得自行其是,随意调价。

2. 凡属国家定价的生活资料,都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价格(包括国家规定的浮动价格),未经批准,一律不得自行变动。对于轻工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生产的商品价格和农村供销社经营的商品价格,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3. 凡属国家定价的工业生产资料,都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价格(包括规定的加价幅度及浮动价格、临时价格),不得随意提价。

4. 重要生产资料的供应业务和紧缺耐用消费品的批发业务,应掌握在国营商业、供销社、物资供销部门和生产这种产品的单位手中,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这些商品的批发供应业务。

5. 对实行市场调节的农副产品,国营商业和供销社要运用经济手段,积极参与市场调节,

^① 根据有关规定,自筹资金用于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建设,不纳入国家基本建设计划:(1)用地方机动财力和预算外资金安排的中小学建设;(2)用县级地方机动财力和预算外资金安排的县及县以下医院、保健站、文化馆、体育馆、图书馆、博物馆的建设;(3)用养路费新建、扩建公路;(4)用城市维护建设资金安排的新建、扩建城市道路和购置新增的公共交通工具;(5)老企业用自有资金安排的职工宿舍建设。

薄利多销,平抑市价,不得压级压价,抬级抬价。

6. 服务行业和饮食行业不得乱涨价,乱收费用。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控制了过度膨胀的社会需求,国民经济中出现的几个问题,有的已得到有效控制,有的已有所缓解。

一是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已趋于正常。与1984年同期比,一季度增长了22.9%,二季度增长了23.3%,三季度增长了17.2%,四季度增长了10.2%,全年增长18%。工业内部结构有所调整,轻重工业比例大体协调,加工工业增长速度有所减慢,能源、原材料工业继续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

二是扭转了银行贷款增加过猛和货币投放过多的势头。银行的信贷总规模,已纳入计划规模中。货币发行量已控制在计划的范围以内。

三是刹住了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的势头。通过开征几个新税种,对企事业单位的奖金发放进行制约,使正常渠道开支的奖金、补贴等大体合理;通过下达工资计划和增资指标,使规定范围内的工资支出按计划执行;滥发奖金、实物的不正之风基本上得到控制。

四是纠正了敞开口子使用外汇的现象。经过对各地区、各部门外汇使用情况的清理,底数比较清楚了。下达用汇控制指标,对于控制外汇结存的下降起了一定的缓解作用。

五是物价改革措施顺利出台,未引起大的波动。

通过一年来宏观经济调节的实践,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宏观调节和控制的目标要明确。1985年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是社会总需求增长过快,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都大大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由于社会总需求过大,造成财政、信贷、物资、外汇上的不平衡。因此,宏观调节和控制的总目标,就是要把过高的总需求压下来,使其大体上同总供给相适应。具体讲,主要是把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住,把不合理的消费需求控制住,把货币需求和外汇需求调节到适当的水平,从而使工业生产发展速度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总目标和具体目标明确,各种措施和调节手段具体,效果也比较明显。

二、调节和控制要适度。实践证明,微观方面放活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宏观方面的调节能力和控制能力。在宏观调节和控制能力不高或未做好必要的准备时,微观经济不要轻易放开,否则,容易出现混乱。同时,也要尽快提高宏观调节水平,促进微观进一步搞活。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进行宏观控制要适度。

三、运用经济调节手段要区别对待,分层次,避免一刀切。我国是一个地域广大的国家,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差别很大,发展也很不平衡。在运用经济调节手段时,必须区别对待,不能都用一种手段和一个办法,以防止苦乐不均,出现新的不公平和一刀切的现象。在当前,进行宏观调节时,对那些可以很快增加供给的生产和建设项目要给予支持。

四、宏观经济调节和控制,要以基本符合实际的计划为主要依据。国家制定的年度计划和中长期计划,是我们指导整个经济发展的行动纲领。计划时期的目标、任务、各种主要指标都经过综合平衡,各种措施都经过认真研究。在一般情况下,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除了在制定计划就已经考虑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也应基本围绕计划的要求进行调节和控制。当然,这个计划应该是科学的,基本符合实际的。实践证明,把计划调节手段和经济调节手段正确结合运用,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五、各种经济手段要配套,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要协调。对一件事情或某一方面的调节,可以运用一种经济调节手段。但对一个比较大的方面和领域进行调节,则

需要综合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这就要求财政、税收、物价、银行、工资和奖金等各种杠杆要同时发挥作用。特别是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更需要各种调节手段协调配套使用。

六、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为新的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创造条件。要放开农副产品的价格，必须相应建立农副产品市场。要发挥银行的宏观调节作用，必须建立和扩大资金市场。要调整生产资料价格，必须扩大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为了控制消费基金，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必须建立和扩大劳务市场，允许和促进人材的合理流动。

从全年的经济情况看，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过快的情况，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主要是预算外投资增长过快，在建项目过多。二是进口增长较快，出口增长相对较慢。三是流动资金供应比较紧，特别是新、扩建企业投产后，缺少流动资金。

从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来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各种经济调节和控制手段配套衔接的还不够紧密；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之间结合得还不够协调；在有些方面，还存在“一刀切”的现象等。这些问题，须要在今后通过不断健全和改善宏观调节和控制的办法，逐步加以解决。

控制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 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

柳 随 年

1985年我国基本建设战线同国民经济其他战线一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全民所有制单位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061亿元；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97个、单项工程134个。在新增的主要产品生产能力中，发电机组容量566.4万千瓦，原油开采1,737万吨（包括油田更新改造和其他投资增加的能力），铁路电器化里程1,103公里，港口吞吐能力5,362万吨，都是建国以来最多的一年。问题是，投资规模大了一些，投资结构也不够合理。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必须认真对待所出现的问题，采取正确的措施予以解决。

投资规模问题是一个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要问题。为保证社会生产以一定速度发展，必须根据国力的可能，进行一定规模的投资。投资规模过小是不利的，特别在当前我国能源、交通运输能力十分不足，原材料非常紧缺，并要为九十年代的经济振兴和繁荣作必要的物质技术准备的情况下，维持适当的投资规模很有必要。但是，历史的经验表明，投资规模过大也不行，那样不仅不能保持国民经济以一定速度发展，还会造成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使经济发展走弯路。198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475亿元，比1984年增加642亿元，相当于1983、1984年两年增加额的总和；比1984年增长35%，是近年来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即使扣除价格上涨的因素，也增长25%左右，远远地超过了同期社会总产值增长16.2%、国民收入增长12.3%、重工业增长17.9%的速度。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增加了318亿元，增长42.8%，更新改造措施增加了112亿元，增长39.5%，都是建国以来增长最多、最快的一年。这些情况都说明，198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特别是

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是投资效果下降。基本建设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由1984年的71.8%下降到70%左右;建设项目投产率,由54.1%下降到48%;房屋建筑面积竣工率由49.4%下降到46%。二是积累与消费同时膨胀。积累率,由1984年的31.2%上升到33%以上。积累率过高,刺激了消费需求的膨胀。据国家统计局测算,每年增加1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就要直接间接地增加消费需求40亿元。三是影响信贷平衡。1985年全民所有制单位用各种贷款完成的投资达354亿元,超过计划发放的贷款额达75亿元。由于票子多发,信用膨胀,导致物价上涨,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四是生产资料供不应求,影响价格上涨。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加上消费基金增长过猛,使需求急剧膨胀,超过了国内物资供应的可能。一方面出现了彼此哄抬价格、相互抢购的现象,造成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多。另一方面国家则不得不拿出有限的外汇进口大量的原材料。钢材进口量1985年达1,900多万吨,相当于国内消费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而大量的进口就导致了国家外汇储备的大幅度下降。五是影响技术进步。大家热衷于铺新摊子,必然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上,必然挤占或挪用更改资金去搞基本建设,妨碍了现有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六是削弱企业活力。许多地方为了多上项目,以各种名目向企业乱集资、乱摊派,使许多大型企业难以增强自我发展和自我改造的能力。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投资规模过大,并不象有些同志认为的那样“总有好处”,而是好处不多,弊病不少。因此,必须下决心控制投资规模,解决投资规模过大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找到造成投资膨胀的原因。我认为1985年的投资膨胀不同于我国过去历次的投资膨胀。过去的几次膨胀主要起因于速度要求过高,计划安排不当,是来自于“上头”,属于“国家的行为”。1985年则相反,主要不是国家计划安排过大,而是地方和企业自行安排的那一块搞得过多。在1985年全社会完成的2,475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中,由国家直接控制的才900多亿元,只占三分之一略多一些,而由地方、企业用预算外资金安排和集体、个人进行的投资则占近三分之二;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完成的1,652亿元投资中,由国家直接控制的也只不过一半稍多,由企业和地方用预算外资金安排的则将近一半。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简政放权,采取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对一些部门实行“投入产出包干”、扩大企业自主权等改革措施,投资决策权下放,地方和企业以自筹资金兴办各种企、事业,这是无可非议的,也是解决当前国家建设资金不足的一条重要途径。在这种情况下,预算外投资规模适当增加得快一点也是必然的,问题出在增长过快,造成了投资膨胀。

预算外投资规模过大,主要是指自筹投资和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银行贷款过多。企业和地方自筹投资增加得太快,有其客观原因:因为需要企业和地方去办的事情太多,企业的职工住宅、子弟学校、托儿所等福利设施欠账很多,职工迫切要求改善的呼声甚高;地方的城市供、排水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十分紧张,文教卫生事业急需加强,第三产业正在蓬勃兴起,如此等等,构成了一股迫使地方和企业早投资、多投资的强大压力。同时企业和地方也确实有钱、有物,投资的积极性又高。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国家在宏观管理上缺乏有力的引导,缺乏必要的控制手段,以致出现了企业和地方乱拉资金的紊乱现象。比如,不少企业用银行贷款充作自筹资金;相当多的企业自有资金根本不留作流动资金,全部用去搞了基本建设。这样做的结果,自然要扩大投资规模,破坏正常的生产建设秩序。银行贷款的增多,也有多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由于国家预算内投资不足,难以满足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的需要,因而在国家计划中就对银行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贷款多作了安排。银行管理偏松,也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各专业银行实行企业化以后,都想多放一些贷款,不仅在基建计划规模之外发

放了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开发和沿海开放城市等贷款（1985年这三笔贷款共为40亿元，大部分用来搞了基建设施），而且还通过信托等方式在信贷计划之外发放了一些贷款。当然，也有企业违反资金使用规定的，它们以借流动资金贷款为名而实际用来搞基本建设。由此可见，1985年投资规模过分膨胀，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微观经济搞活的情况下，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措施没有相应跟上去，这就使投资膨胀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因此，在新形势下，要控制住投资规模，必须从加强宏观经济的管理着手，但实践证明，仅仅靠传统的行政控制手段，作用是有限的。1985年为了控制投资规模过大，国务院连续召开了几次省长会议，下决心采取了包括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派工作组检查等断然措施，对刹住投资膨胀风起了积极的作用，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投资规模还要大。这些措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采用。但今后重点应该是加强和完善经济调节手段，包括对银行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实行差别利率、对自筹基建投资实行差别建筑税率等等。同时还要完善经济立法，对投资有关的问题作出一系列的规定。例如：投资规模的审定（要有严格的审批程序）；企业自有资金的使用（一定要先留足流动资金）；银行贷款的安排（一定要贯彻先生产后基建的原则）；原材料的平衡（不能建立在过份扩大进口的基础上），等等。当我们拥有了这样一整套的综合控制手段（包括行政的、经济的和法律的）之后，控制投资规模才会成为可能。

投资结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投资结构决定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目前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正是过去投资结构不合理的反映。因此，要保证今后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持久而协调地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投资结构。目前我国投资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投资比例偏低，生产性投资比例偏低。1985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投资比重占48.8%，比1984年的53.7%降低4.9%；生产性投资比重占54.4%，是历史上最低的。当前能源、交通、原材料供应就十分紧张，如果对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不及时进行调整，将来还要紧张。这是一个关系到长远，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2000年战略目标的大问题，必须统一思想、认真解决。造成目前投资不合理的根本原因是现行的产品价格扭曲，给了地方和企业的投资决策人以错误的投资信息，使他们只顾眼前的利益，看不清全局，形成“投资短视症”。当然也有一个计划安排不妥的问题，比如不少地方安排非旅游性的楼堂馆所数量过多，标准过高。还有一些地方借国家允许中小学、县以下的卫生文化设施、用养路费新建扩建公路、老企业用自有资金安排的宿舍等建设，可以不纳入国家计划的机会，把一些与之毫不相干的加工工业也甩在计划外，既扩大了投资规模，又促进了投资结构更大的不合理。这个教训是很值得我们吸取的。

解决投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要想恢复过去那种由国家“一统天下”的办法是行不通的，这不符合党的开放与搞活的总方针，能考虑的方案只能是在严格控制投资总规模的前提下，在投资内部作合理的调整。首先是要扭转目前有些地方和部门重加工工业、轻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重基本建设、轻改造，重非生产性建设忽视生产性建设的思想和作法。同时，要通过各种经济调解手段，对重点建设以外的投资进行引导，对其中耗能高的项目，重复建设的项目，必须下决心课以高税，坚决限制。特别要强调指出的，当前尤其要注意压缩除必要的旅游设施以外的办公大楼、展销大楼、各种中心等非生产性建设。住宅建设，也要有一个恰当的比例，稳步进行。城市市政建设应把重点放在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基础设施上，形式主义的东西坚决不要搞。这样就可适当增加生产性建设投资。只要生产性投资比重提高了，一般加工工业建设受到了应有的控制，重点建设才可能有所保证，国民经济发展才能积蓄后劲。

1985年已经过去了，在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我们迎来了第七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控制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乃是“七五”计划基本任务之一。为实现这项重大任务，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党中央和国务院确定采取“逐步调”而不是“急刹车”的方针。即：在1985年控制规模的基础上，“七五”前两年（1986、1987年）的投资规模不扩大，大体维持1985年的水平，适当改善投资结构；后三年的投资规模视条件的可能，适当增加一些，进一步调整投资结构。这是一个很正确的决策。可以相信，只要我们坚定地执行这个决策，就能在控制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方面取得成效，就能使整个经济逐步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持续、稳定、协调地向前发展。

工业要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周 才 裕

工业发展速度是否适当，对经济发展关系极大。我们都希望工业发展得快一些，经济发展得快一些。但是快到什么程度，怎样发展才是合适的呢？这是我们要集中力量予以解决的问题。

“六五”期间我国的工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85年工业总产值达到8,299亿元，比1980年增长67%，平均每年递增10.8%。“六五”时期，轻工业有了较快发展，轻重工业比例趋于协调；煤炭生产大幅度增长，缓和了原来供应十分紧张的局面。石油、电力、钢铁、水泥、化工等基础工业都得到加强，机械工业、乡镇工业更是飞速发展；整个工业的技术水平有所提高，上缴利税有较多增加。这些成就是巨大的。无论同我国过去的情况比，还是同国际上同时期的情况比，都是很突出的。

“六五”工业的发展，经历了调整、发展、过热、趋于正常的复杂过程，发展速度也呈现出低速、高速、超高速、趋于正常的变化。由于过去经济建设中“左”的政策，造成严重比例失调，“六五”初期国民经济被迫进行调整，缩小建设规模，压缩重工业，着重发展农业、轻工业、能源、交通，同时对农村实行改革。1981年是调整的第三年，工业速度只有4.1%，工厂严重开工不足，财政收入下降，每百元积累创造的国民收入下降到23元的最低点。调整起到了作用，形成了原材料、机器设备的买方市场，换得了以后几年的高速发展。1982年，农村改革大见成效，农业丰收，工业企业扩权取得了效果，工业增长速度达到7.7%，财政收入由下降开始回升，外汇也有了节余。1983年农业继续丰收，国务院颁布了工业企业扩权十条和计划体制改革十三条，工业出现高速发展，达到10.4%，财政收入增加，外汇结存增多，各方面工作都有较大进展。1984年前三个季度工业继续稳步高速增长，达到12.5%，财政收入继续增加，经济效益提高，积蓄了力量，为加大改革步伐提供了较好条件。党中央适时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从1984年第四季度开始，盲目追求高速度之风又起，有些地方、企业大量发放奖金、贷款，投资和消费基金猛增，需求膨胀，商品供不应求，紧俏商品骤增，几乎没有什么滞销产品，生产迅速扩大，第四季度工业增长速度达到17.9%。1985年一、二月份又猛增到23%，进口原材料和散装件大幅度增加，外汇结余急剧下降，货币发行大大突破了计划，通货膨胀，

产品质量严重下降,落后工艺恢复,原材料、燃料消耗上升、交通运输十分紧张。显然,需求大大超过了供给的可能,国民收入超分配,经济发展过热了。

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着眼于控制过渡膨胀了的需求,规定了对工业发展速度、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财政赤字、信贷资金、货币发行和年末外汇结存等方面的具体控制目标和措施,先后召开了四次省长会议进行贯彻,下达了一系列文件,采取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相结合的办法,抽紧银根,控制银行贷款,查税收,查物价,查质量,使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七月份以后,工业速度减缓,到11月、12月,当月工业速度下降到8.8%、10.2%,接近正常。能源、原材料工业继续稳步增长,机械、轻工和乡镇工业发展速度大大减缓,产品质量下降趋势得到控制。1985年的发展速度有些过高,原因不在当年。1985年的工作是扎实的、实事求是的,通过1985年的调整,为1986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六五”工业发展过程再一次告诉我们,工业发展速度过低,会影响经济潜力的发挥,人民生活不能较快提高。工业发展速度过高,超过实际可能,会造成比例失调,通货膨胀,外汇短缺,产品质量下降,消耗升高,难以为继,大起大落。发展工业要根据工业的本身及其外部关系来进行。工业是多部门分工合作的社会化大生产,相互间关系密切,错综复杂,互为条件,不容许有大的脱节。工业的发展以农业、市场、金融、运输、文教、科学等为其外部条件,也不能有大的脱节。尤其是农业对工业的影响极大。这几年工业能较快地发展,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能抽出劳动力来从事小煤矿、小矿山、服装加工以及其它乡镇工业。农业对工业提供原料和市场的作用也是巨大的。工业的发展依赖于建设和改造,各行各业的建设和改造,难易不一,也要妥为安排,协调一致。由此可见,工业自身的发展规律,也要求工业的发展是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怎样才能达到工业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呢?

一、必须坚持经济体制改革。改革旧体制,解放生产力,这是发展工业生产的关键。“六五”时期工业所以取得出乎意料的成就,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分不开的。几年来,工业贯彻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把市场机制引入计划经济,企业的经营管理开始放开手脚,在计划、购销、资金、人事等方面有较大的自主权,有的还实行了承包、租赁、“全民所有、集体经营”、与国外合资等等,增强了企业的活力,使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

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又大大刺激了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求。地方、企业、民间的权力扩大了,就要搞建设,搞改造,求发展,投资规模随之扩大。事业发展了就要增工资,发奖金,分利润,消费需求也就大大增加起来。这就为发展工业创造了外部条件。

“七五”计划规定要把改革放在首位,要用五年或更多一些时间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重点是城市改革,中心是搞活企业,这也是工业体制改革的任务。搞活企业就是要把企业变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真正能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现在,中小企业、集体企业比较活,而国营大中型企业不够活。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大中型企业要眼睛向内,发挥自己的优势,搞好企业内部的改革。要搞好技术进步,划小核算单位,开展多种经营,改革人事制度,把企业变成开拓型、经营型的企业。第二、打破部门、地方的限制,在国内也要实行开放政策,形成广大的国内市场,推动竞争,加强横向联系。第三、逐步减少指令性任务,产供销经营方面的权限尽量让给企业,领导机关要多用经济杠杆和经济立法,把管理企业的重点放在为企业服务上。

二、要搞好宏观控制。改革呼唤出来的需求和生产力是巨大的,但往往是不配套的,如果差距过大,就有可能刺激经济过热或影响经济发展。因此就有一个如何控制适当的问题。

看供求是否有大的失调,执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主要是看通货膨胀、外汇储备、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等如何。这些指标,在传统计划经济的国家里是事先安排的,反映不出经济的变化。我国实行改革以来,价格、货币、外汇的作用大了,通货膨胀,外汇储备等可以较灵敏地反映当前供求关系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工业的发展,如果没有伴随通货膨胀,外汇储备没有大幅度下降,那么,供求关系就是适当的。反之就要采取控制措施。1984年第四季度和1985年上半年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就是这样的。

宏观控制,主要是控制总需求,同时也要控制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一般说来,在这样的国家里,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关系大致适当了,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也就比较容易安排适当。需求的膨胀,往往是在生产情况较好,物资库存较多,财政有结余,外汇有储备的时候发生,这就需要计划得远一些,要适当留有余地,以丰补欠。

宏观控制有事前控制和事后控制。事前控制主要是计划控制,科学的计划对于搞好宏观控制,发展经济作用是很大的。计划要注入市场机制,多用经济杠杆,经济法规,少用行政干预。有些经济活动本身就要求事前有较周密的计划,例如工资、大项目的建设等,上去了就很难下来,工资尤其是这样。至于事后控制,关键在于及时发现,采取措施,否则损失就大了。这就要求有及时准确的信息。有了信息,采取哪些措施,控制到何种程度,也要根据较长时间、较全面的要求来决定,这也要有计划。因此,计划——科学的计划应是宏观控制的依据。宏观控制,银行的作用是很大的。市场经济国家的银行有庞大的研究经济的机构。我们更要加强计划部门和银行的合作,银行大的活动要服从国家计划。

三、注意调整工业结构。工业结构适当、产业结构适当,就能有好的经济效益,能较好地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工业结构适当的标志是:生产资料的生产能较好地满足生产、建设的需要,消费资料的生产能较好地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时,生产能力能充分发挥,产品无积压,技术不断进步,无通货膨胀,外汇有一定储备。“六五”期间,我们针对当时的情况,突出发展轻工业、能源、交通,把整个工业大大向前推进了,较好地满足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七五”期间我们要继续根据需求变化调整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结构。现在的主要矛盾是电、油、主要原材料、交通运输不够,我们要狠抓。对于加工工业特别是机械工业,我们也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加工工业多数是最终产品,对需求的波动最为敏感。加工工业一般投资较少,建设时间较短,盈利较多,大家愿意搞,因此,工业结构不适当往往表现为加工工业能力过大,同时,在这个总的过大中,又包含着许多重要产品生产能力不足和技术水平太低。这种现象反映出工业盲目发展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因此,在调整工业结构时就要注意加工工业和原材料、能源工业的关系,要压缩一部分加工工业的投资给原材料、燃料工业。同时,要注意对加工工业内部进行调整,把那些一般性的机械工业、轻工业的生产能力,转到较高级产品上去。要做到这一点,只靠计划安排是办不到的,要在周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价格,税收、差别利率并通过立法等办法,促进加工工业向高级产品转化,并更好地为原材料、能源、交通服务。

四、大力开展对老企业的技术改造。“六五”期间,通过推广国内的科研成果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我国各行各业的技术水平都有了一定提高。但是,总的看来技术水平仍是很低的,这是发展工业的一大障碍。我国的机械产品5万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只占26%。1985年进口各种机电产品178亿美元,而出口机电产品只有12.9亿美元。我们的轻纺产品花色品种少,适应国际市场变化慢、质量差,不少市场丢掉了,不少产品进入不了国外的大百货公司。“七五”要广泛开展对老企业的技术改造,力争取得大的成果。要扩大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的自主权，企业改造的总体规划批准以后，即可根据具体情况组织实施，不再逐项报批。要制订行业技术改造规划，以便更好地指导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要广泛开展横向联系，发展专业化协作，充分利用军工企业的生产能力。制订经济办法，运用经济杠杆引导，使技术改造投资主要用于提高质量，降低消耗，增加品种上。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是我国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主要措施。我们要吸取过去引进技术的经验，减少重复，减少成套和一般性技术的引进，加强消化吸收。现在日本、美国出于外部条件和自己国内的需要，将会比过去较多地输出一些资金，转让一些技术。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根据国内的需要，更好更多地引进一些先进技术，适当扩大利用外资规模，以加速我国的技术改造。

五、加强工业企业管理。先进的科学的管理，是提高产品质量，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生产所必须的。近一两年，我们对企业管理有些放松。1985年一些工业产品的质量一度降低，有的就是由于放松了管理引起的。搞好企业管理，首先要有一个严字，态度要严肃，规章制度和纪律要严格。对企业要有高的要求，对有些产品要限期达到国际水平，定期评比。领导干部要能干，熟悉专业，能团结人。工人要参加管理，发挥主人翁的积极性。企业的自主权要落实。要搞好基础工作、财务管理、经营管理，广泛采用先进技术，搞好文明生产、安全生产，大力提高经济效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同时，要给企业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改革要配套进行，要造成一个供求关系大致协调的环境，要有正确的价格、税收、利率和投资政策，使企业既有活动的场所，可以获得必需的市场、资金、物资、设备、技术和人材，又有竞争的压力，促使企业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总之，要做到工业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工业自身的艰苦努力，又需要相关部门以致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改变长期以来产品供不应求，皇帝女儿不愁嫁和吃大锅饭的状态；改变企业不重视质量、管理、技术进步、因循守旧的习惯。要认识到，我们搞四个现代化，翻两番，首先是在质上要翻番。离开了质的提高，翻番就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一定要搞好经济体制改革、搞好宏观控制，同时搞好工业自身的工作，促使工业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论 乡 镇 企 业 的 发 展

吴 象

近几年来，我国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一支举足轻重、十分活跃的力量。从1979年到1984年六年间，乡镇企业向国家共缴纳税金232亿元，占整个农村缴纳税金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1984年全国乡镇企业的总产值达1,700多亿元，比上一年增长40%；纯利润达187亿元，为1978年的2倍多。1985年在银根紧缩的情况下，乡镇企业仍以35%的速度增长，总产值达2,300亿元，从业人员由上一年的5,200万人增加到6,000万人。这一点意义特别重大，因为“八亿农民搞饭吃”是我国经济落后的突出表现。耕地严重不足，农业劳动力过剩，是农村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最大困难。现在找到解决这个困难的途径了，这就是发展乡镇企业。1985年党的代表会议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中指出：“发展乡镇企业是振兴

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这是对乡镇企业的高度评价，也是指导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方针。

乡镇企业的前身即社队企业，从1958年就开始建立了。但是，由于公社体制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等弊病，依附于公社体制的社队企业也为这些弊病所苦，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七十年代苏南等地由于一些特殊条件和机遇，社队企业开始有比较明显的发展，但就全国而言，基本上仍处于无声无息的状态。八十年代联产承包制取代公社体制之后，社队企业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了出人意料的迅猛发展。这主要因为，农村“大包干”的普遍实行和统派购制度的逐步取消，使亿万农民获得日益充分的自主权；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使农村有了大量的剩余劳力、比较充足的资金和原料；党和政府放开搞活的政策，鼓舞着越来越多的农民放胆向非农产业领域进军；近年城乡对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需求的迅速增长，向乡镇企业敞开了巨大的市场。这些条件的互相作用，使多年来运行于不同的轨道的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终于开始走向历史性的汇合。这个历史性汇合的产物，就是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它反映了我国农村蓄之已久的社会生产力的迸发，适应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进程，因此具有特别顽强的生命力，一开始来势就很猛，披荆斩棘，锐不可挡。1984年得到中央1号文件和4号文件的肯定，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发展的高潮。

乡镇企业是农民办的工业，一不用国家投资；二不用国家派干部；三不用管“吃、喝、拉、杂、睡”。国营企业可以“等、靠、要”，乡镇企业等不着、靠不上、要不来，不能不自力更生，不能不艰苦奋斗，不能不按价值规律办事，而它的生命力也正在这里。现在的乡镇企业与过去的社队企业已经有根本性的不同，它把农业承包的一套比较成功的经验运用到企业中，实现了权、责、利的结合，铲除了“大锅饭”的弊病。乡镇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正好适应农村劳动力后备资源多、就业压力大的特点，可以起到用劳动力弥补资金不足的作用。乡镇企业规模虽小而自主权大，有利于与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结合，产品、技术、设备更新换代快。产品比较容易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廉，人廉我转”，竞争力强，比较容易应付市场的变化。近几年中，经过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不仅原有企业大部已得到改造，而且出现了不少新型的现代化的骨干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不可否认，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也确实带来了不少新的问题，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但是，乡镇企业的持续发展，却正在为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创造条件。其中人们最关注的，是乡镇企业和农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问题。

近年来，一些地区在发展乡镇企业过程中，出现了占用耕地过多、工业性污染扩散、影响农业的生态环境，务工务农收入差距拉大、农民经营农业的积极性下降，农村青壮劳力转移到乡镇企业引起务农劳力素质下降等现象。面对这些问题，不少同志担心乡镇企业发展会挤掉农业，或者导致农业的萎缩。从总的方面看，可以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实践证明，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以牺牲农业为代价，不以农民破产为前提，它正好反映了我国农村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从世界历史上看，几乎所有实行工业化的国家，其城市工业的兴起，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总是以牺牲农业和剥夺农民为前提；其工业与农业的分离，也都表现为城市同农村的对立。然而在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却缓解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矛盾，使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和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有了若干过渡性的、多层次的中间环节，从而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提高了农业的生产率、商品率，直接间接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在宏观经济中，初步展示了乡镇企业与农业并存和协调发展的前景。

最近几年乡镇企业的较快增长，既是建立在农业持续繁荣的基础之上，也是这个基础所不能包容的巨大生产力的迸发，并且，它反过来又推动了农业的现代化进程。转移到乡镇企业的几千万“农民工人”和他们赡养的上亿人口，需要农业提供大量粮食和农副产品；乡镇企业本身，也需要总量日益增大的农副产品作为原料。因而，从根本上说，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一个稳定增长、日趋繁荣的农业与之相适应。

不少地区，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中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形成的新的农村经济结构，是建立在产业分工和各业新的相互关系基础之上的。这种关系一旦形成，再试图退回到原有的经济结构中去，或者根本不可能，或者只会导致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紊乱，而且这种紊乱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将比乡镇企业发展本身面临的问题要严重得多，也更难解决。

在经济生活中，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农业的现代化水平提不高，农业的生产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丰度，实质上就是靠天吃饭，这样，农业这个基础就根本谈不上稳定。苏南等地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之后，从资金、技术、物质、农机、动力等等方面，对农业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其总量超过了同一时期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在收入分配上则采取“以工补农”的方式，补贴务农劳动力的收入，保证了农业的稳定发展。在这类地区，可以这么说，离开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乡镇企业对农业的扶持，农业就要陷入危机，农民就要陷入贫困。限制或打击乡镇企业，就必然转化为限制和打击农业，并最终转化为打击农民。由于乡镇企业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稳定的基本条件，“无农不稳”也就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转化为“无工不稳”了。

苏南等地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其它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状况的预演。也就是说，农村工业和第三产业越发展，农业最终才会更加稳定。这是我国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特点。

最近几年，农村中靠经营农业致富的不乏其例，可是从总体上考察，要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农村的经济状况，使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如果光靠农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即仅仅寄希望于农业的发展是不够的。八亿人从事农业生产，无论生产的水平多高，产品的总量多大，平均分配到每个农民，其收入状况是不可能很好的，富裕程度也不可能很高。农民正是从这里，总结出“无工不富”这个规律。在我国，农村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已经使相当一批农民走上致富道路。由于农村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的技术进步和经营规模扩大，因而使经营农业也能致富，这也正在为实践所证明。

当农村经济还处于单一结构条件下，农产品不可能大量剩余，农业必然处于自给、半自给状态，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非常有限，当然也就缺少大规模商业活动赖以存在的基础。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使有商业活动，农村的经济也不会活起来的。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经济史，就是长久地处于这种状况的历史。我国是商业活动出现较早的国家，但是由于社会规模的分工不发达，产业分化程度低，商业活动只能建立在有限的农产品剩余之上，表现为一种带有明显消费特征的经济活动。商业的繁荣，没有持续的扩大再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能长期维持的，只能随着剩余农产品供给状态的变化而周期动荡。

现代商业的繁荣，则是建立在社会规模的产业分工之上，它由一种主要是消费实现的手段，转化为社会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实现的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在现代产业分工的基础上，商业活动、市场流通才能发挥其刺激生产、组织协调生产的积极功能，“无商不活”也才真正具有规律性。

凡是具有生命力的新事物，都是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的。如果我们认真地回顾一下，最近几年来，乡镇企业在经营管理素质提高、技术开发、产品开发、市场开发、人才开发等方面